

延安时期从严治党实践 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

张 玉,王 乐,曹均学

(西华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时就十分重视自身建设,延安时期坚持从严治党更成了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手段。首先,从严治党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持党内团结稳定的必然选择;其次,从严治党是克服党员干部党性不纯等错误倾向的重要手段;第三,从严治党是解决党员队伍的迅速扩大与党内消极思想严重之间矛盾的现实要求。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思想建设对从严治党的重要作用,坚持以制度治党大力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最终实现从严治党。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而延安时期的各项实践举措,对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从严治党;治理能力;启示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4-0038-06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进入新时代以后,新问题和情况不断涌现,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这就要求不断提高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就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才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从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从严治党就开始了伟大的探索和实践,而这些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对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逻辑前提:中国共产党为应对复杂革命斗争形势的必然选择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关于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就受到了高度重视。在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以及抗日战争的艰苦斗争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从严治党对于我们党应对复杂革命斗争环境的重要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就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对党员进行了政治教育和各种专业性工作培训,自此展开了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

(一)从严治党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保证党内团结稳定的必要手段

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武汉等以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

收稿日期:2021-05-22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项目“新中国70年政治发展道路及其基本经验研究”(SC19B124);南充市社科规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项课题“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内民主建设研究”(NC21JD100B046);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年院级课题“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与乡村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MKS2020016)

作者简介:张玉(1993—),女,重庆綦江人,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王乐(1995—),男,宁夏石嘴山人,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曹均学(1964—),男,四川武胜人,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各种复杂情况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之下,日本法西斯妄图独占中国的野心更加膨胀。西方各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希望中国可以牵制住日本法西斯,在对中 国表示同情的同时,又以牺牲中国的部分利益为筹码向日本妥协。在国内,坚决主张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抗日的热情不断激增,但是不利的局面也不可避免地凸显了出来。首先,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不断发展,然而由于各种不利因素的叠加,人民群众对党的认识还很模糊。其次,虽然人民群众抗日热情高涨,但是对于如何坚持抗战还很迷茫。因此,在对中国共产党了解不深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将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与此同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日军攻势受挫显得后劲不足。鉴于这种情况,国民党方面对日作战的积极性大幅下降。在国民党内部,各种反对共产党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给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团结与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战争局势的发展也不容乐观,自1941年起,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遭到了日军疯狂的扫荡。“这一年中,扫荡与反扫荡有数十次,敌人上万人的大规模扫荡也有十多次,这在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2]此外,在当时,华北地区各种自然灾害越来越多。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生存环境也越来越差。即使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依然越发壮大。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从严治党的基础上实现了集中统一领导,全党上下团结一心,努力奋进,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政党、一个有责任担当的政党。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使命也越来越重。所以,在如此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为了抵抗敌人对党的分化与破坏,共产党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稳定。坚持从严治党,提高党员干部的革命意识,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维持团结稳定的必要手段。

(二)从严治党是克服党员干部党性不纯问题的重要途径

所谓党性,就是党的内在本质在每个党员干部身上的外化与表现,它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立身为正、服务人民的重要基石。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部分地方党组织和极少部分党员同志存在着无产阶级信仰意识不强、党性修养匮乏的错误倾向。这些错误倾向集中表现为思想上、组织上以及行为规范上。在思想上,部分党员干部和地方党组织政治立场不够坚定,不尊重党组织集体的决议,在各种公开场合胡乱发言,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组织领导上,过分强调独立行动,反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各自为政现象突出;在思想意识上,崇尚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角度出发。政治意识淡薄,政治上追求自由行动,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些党性不纯的党员干部必然会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为此,在党中央的领导与部署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次关于增强干部信仰与党性的运动,显著加强了党员干部的党性原则,提升了共产党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信仰。共产党员的革命信仰最大程度地展现与表达就在于他们的党性是否纯洁。党性是一个政党的固有的本性,更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最集中的表现。刘少奇同志在《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中指出:“所谓的党性,就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为重,更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打算。”^{[3]349}关于党性,任弼时同志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4]231}

中国共产党以延安整风运动为契机,从严治党管党,显著增强了广大党员的党性修养。因此,从严治党是克服党员干部党性不纯错误倾向的重要途径。

(三)从严治党是解决党员队伍迅速扩大与党内消极思想严重之间矛盾的现实要求

在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组织发展的黄金时期。伴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的下发,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与日俱增,党员的成分也不断发生着变化。这些新增的共产党员中的很大部分出身于小生产者和知识分子,成分日益复杂。与此同时,抗日战争期间党所处的环境也极为复杂险恶,全国范围内有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之分,抗

日根据地又分为老区和新区,且各个抗日根据地又呈分散状态。抗日根据地又主要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斗争的主要手段是游击战,因此,党员的活动就比较分散,也更加难以统一管理。“有些党员同志对党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更有甚者是对立的态度。”^{[4]241}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党员干部缺乏组织纪律性,更缺少大局意识,革命的斗志日渐消沉,各种分散与独立的思想也开始扩散,此时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已经潜藏了巨大的危机,那么,提高纪律意识严把党内纪律关就成为十分紧要的工作,从严治党就成为解决党员增多所引起的思想涣散问题的现实要求。

二、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实践举措:以思想建设为重要抓手

(一)提升党员文化素养,筑牢从严治党的现实基础

注重党员干部文化知识的学习,进一步培养具有高度专业性的党员干部,为中国共产党治党管党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主要的依靠对象和党员成分来自于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国共产党进行从严治党就不可避免地在对党员干部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增强他们的自律意识、守纪意识,最终才能让党员干部自觉听从党中央号召,维护党中央的权威。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其重点是研究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肩负着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工作。同时,在全党上下广泛开展了马列主义学习竞赛。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入了解研究马列主义之后,批判地学习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抗战理论,最终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此后,中央军委也强调:要吸收先进知识分子加入军队,使知识分子工农化,同时抽调老兵和干部进学校学习,使工农干部知识化^[5]。党中央也把加强文化水平较低的学员的识字工作作为党校培训的主要任务加以明确。党中央还关注到了基层党员干部的文化培训问题,指出要加强党员干部文化知识的学习,要求各级党委机关要依据客观现实因材施教,按照具体的需求来编写文化教材,并且在党员干部学习教材中适当加入自然科学的内容。

随着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展,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升了党员干部的文化素养,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干部的专业性。在党员干部自身综合素质提高的过程中,深化了党员干部对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和方针的理解,对政策的执行力度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总之,从严治党在党员干部文化素养的提高过程中落到了实处。

(二)注重政治理论学习,培育党员理想信念,筑牢从严治党思想根基

加强广大党员政治理论学习,培育党员理想信念,一直是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用正确的政治路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教育党员。1937年夏天,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让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全党。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更要在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以科学的理论武器来武装自己,并在革命的实践中学以致用。党中央还特别强调,全体党员干部都要深入了解时局状况,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刻领会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方针,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而不懈努力。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特别强调要纠正长期以来党内普遍蔓延的教条主义问题,强调要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实践的理论,并且在具体工作之中加以灵活运用,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求务实的态度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

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在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政治理论学习的过程中,摆脱了教条主义对党员干部思维的束缚,为全党统一思想夯实了思想基础,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

(三)以制度治党服务思想建党,使制度治党的过程与思想建党的过程紧密结合,提供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

中国共产党进行制度治党的探索与实践自建党之初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丰富和完善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从严治

党的实践起点。自延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对制度治党的探索就是与思想建党的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认识上来讲,刘少奇认为:“简单的处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处罚与打击过多会束缚党员群众的自动性和创造性。”^{[6]43}194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刘少奇同志进一步指出:“部分同志因为思想政治上的软弱与盲目,不知道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建党,只是单纯的从组织上建党。”^{[7]329} 这些观点都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关系的认识。从实践上来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思想建党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中共七大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一举措,既是推进全党思想统一的过程,也是全党反对分散主义和山头主义,加强制度建设的过程。从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的关系来看,中共七大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思想建党和以七大党章为基础的制度治党的有机结合。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实践表明,思想建党每前进一步,制度治党就跟进一步,制度治党的发展服务于思想建党的进程,二者相辅相成,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健康发展。

三、从严治党要以思想建设为重要举措:延安时期从严治党实践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

(一) 始终坚持以党的思想建设为从严治党的重心,推进政治建设,严明组织纪律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整风运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决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党内蔓延的错误倾向,进一步促进了全党上下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完全统一,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团结,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新时代要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就必须始终坚持以思想建设为重心,从严治党要严明全党上下的组织纪律,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做到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实践经验来看,广大党员干部上下一心,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行动上严守组织纪律,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具有超强战斗力的秘诀。

当下,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时代的发展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团结一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如果广大党员干部没有严明的纪律意识,必然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从严治党就是要把政治纪律教育作为推进思想建设工作的重点,引导全党上下具有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遵守党章和宪法的各项规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我们党才能有力量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 始终坚持以制度治党服务党的思想建设,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

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把思想建设和制度治党结合起来一体推进,制度治党服务于党的思想建设工作的持续推进。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育工作,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党内学习制度,让不断完善的制度为干部教育服务。干部教育是党推进思想建设以实现从严治党的的重要手段,制度的建立是党推进思想建设工作的重要保障。1939年成立的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就是为了应对新的革命形势变化和党内干部教育新需要而推进的一项重大制度措施。此后,中共中央为了细化教育制度的结构和层次,还对学习制度进行了调整,建立起了不同层次的学习制度,从而让全党上下的集体学习落到了实处。

延安时期的党中央十分注重用制度建设来培养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列宁认为:“思想的一致是用物质的统一来巩固的。”^{[8]526} 列宁的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用制度治党服务党的思想建设工作的思路是高度一致的。也就是说,党员党性修养的提升必然会提升制度治党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党成为团结统一的集体,也才能让我们党有信心也有能力在残酷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实现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对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延安时期我们党局部执政的成功经验来看,只有注重党的制度建设,通过制度治党进一步服务于

党的思想建设,通过加强党员干部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党性修养,才能让广大党员干部真正做到权为民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

(三)始终坚持发展和完善干部教育体制机制,提高党的思想建设水平,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

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实践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成效显著,正是得益于干部教育的强化和监督学习机制的不断创新与完善。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然后辅之以学习小组和顾问团制度,这些制度使中国共产党培育了一大批有理想、有信念、守纪律、听指挥的优秀人才,为党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首先,在思想上,注重培育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不断强调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切实加强全党的统一性和团结性。其次,在组织领导上,要求并督促全党从上到下的每个机构的负责人都要定期参加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其他同志对自己的意见和批评,来提高自己的党性修养和思想觉悟;再次,在组织纪律上,加强纪律教育,做到有错就改,不能讳疾忌医,有效地严明组织纪律。

全面从严治党需要不断完善干部教育长效机制,确保党员干部做到思想跟党走、政治不动摇、实践中听中央号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在借鉴延安时期干部教育成功经验的同时,不断根据新情况和新问题,来完善党员干部教育的长效机制,以确保思想教育落到实处、党的思想工作可以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首先,要坚决推行干部教育党委领导负责制,让各级党委领导都要认识到干部教育对实现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并且要进一步明确干部教育的要求和目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计划。其次,要构建科学的干部教育方法体系。以各地方党校为主体,充分发挥新时期互联网教育资源优势,使广大党员干部可以便捷有效地获

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以便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应对复杂的革命斗争环境,以从严治党为重要举措,促进了全党上下的团结统一。延安时期的从严治党以推进党的思想建设为重点,注重提升党员干部的文化素质,强化他们的政治理论素养,进一步探索出了以制度治党服务思想建党的从严治党新模式,为全党上下团结一致和健康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只有在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历史经验中汲取养分,才能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面对风险和挑战的能力,提高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参考文献:

- [1]新华社.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2019-11-06.
- [2]邸华. 今年华北的扫荡与反扫荡[N]. 解放日报,1941-12-28.
- [3]刘崇文,陈绍畴. 刘少奇年谱(1898—1969)[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4]任弼时. 任弼时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5]王乐,冯开甫. 延安时期“思想建党”实践及其当代启示[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 [6]刘少奇. 论党的建设[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 [7]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nlighten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from the Practice of “Runn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in Yan’an Period

ZHANG Yu, WANG Le, CAO Junxue

(School of Marxism, Xihua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its self-construction. The CPC’s running itself with strict discipline in Yan’an period is the important means for strengthening its self-construction. Firstly, runn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CPC maintaining intraparty unity and stabilit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Secondly, it i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overcoming the wrong tendency for impure Party spirit of cadres. Thirdly, it is the actual requirement for 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rapid expansion of the Party team and severe negative thoughts within the Party. Meanwhile, the CPC has realiz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for running itself with strict discipline, sticking to greater promotion of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by running the Party with regulations and finally realizing runn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At this stag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quires the CPC to stick to running itself with strict discipline comprehensively, and the practical measures in Yan’an period are of grea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level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 Yan’an period; run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governance capacity;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雪 箫)